

对劳动人本政治观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萧 斌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14)

[作者简介] 萧 斌(1939-), 男, 湖北监利人,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研究员, 湖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摘 要] 马克思的劳动人本理论揭示了政治生活起源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的内在需要。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 是社会的政治主体利益的全局关系所支配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社会政治(广义政治论)同阶级政治(狭义政治论)有联系又有区别, 把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的完整的劳动人本政治学说, 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崭新成果。社会主义是从阶级政治走向社会政治的过渡, 其发展之艰辛、道路之曲折, 都是空前的。劳动人本政治理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发展而发展; 即使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类的暂时中断, 但人类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大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关键词] 广义政治; 劳动人本政治; 社会政治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4 \ | 0438-07

对于政治起源问题, 人们从古至今提出了种种说法。近代以来, 西方学者所作的理论回答, 无非是借用人的“自然本性”或者以抽象的“社会本性”加以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说法和理论, 历来都持批判的态度, 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研究政治生活起源的途径与方法, 但他们并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 也无人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进程, 政治的起源及其内涵问题就不能不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时代性课题。

一、必须以创新思维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境界

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也在一段时间内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科学研究, 不但出现了解读马克思主义不准确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观点, 而且还十分武断地把错误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主义。此种恶劣作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的伤害尤深, 其最大祸害莫过于在政治、阶级与国家之间划等号, 把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简化为一切政治都是阶级斗争; 把一切阶级斗争又都归结为夺取国家政权、巩固国家政权等等。几十年思想理论上的混乱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悲惨结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因素虽复杂, 但追根溯源, 工人阶级执政党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混乱以及在此指导下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不能不是首要因素)。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我们党以理论创新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 科学地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出现了伟大实践呼唤科学理论的大好局面。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 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取得了进展。刘德厚教授积多年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深厚功力, 吸取近些年来国内外政治

学、政治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研究的成果,通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围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权力人民化、社会化的时代要求,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人本政治理论”的学术体系,写作、出版了《广义政治论》这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力作。

“劳动人本政治理论”,就是把人的关系的本质性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用以说明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的人本化的理论。其基本内容,从起源上看,认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之所以发生,完全出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及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它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从内涵上看,认为政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在利益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和支配地位的关系,对政治的界定,应该将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区别开来。一般来说,政治是指社会的政治主体利益的全局关系所支配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当代考古学证明,大约在50万年至3万5千年之间,原始现代人不仅早已取得了同动物有本质区别的人的“类存在形态”,而且“群体存在形态”即氏族—部落组织也日益完善,就是“单体存在形态”即具有鲜明意识与个性特征的个人,也在日趋成熟和发展。他们在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中,进行“两种生产”(人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形成各种生存与发展的利益联系,过着两性生活(不同形式的族外婚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由这些生产与生活而产生的内在需要的政治生活,即对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杰出的人类学家摩尔根把这种组织管理工作称之为“政治”,认为其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寻找”^[1](第5页)。随着私有制产生而出现的阶级分化与斗争,导致人类社会从原初的社会政治形态进入国家的政治社会形态,政治功能便从单纯的社会管理逐步发展为以阶级统治为主兼及社会公共管理。随着利益的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发生,政治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便日益复杂多变,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功能对社会兴衰进退的作用也日益强劲,这就促进了对国家政治生活进行研究的各种政治理论及其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在阶级社会里,各个政治主体的利益无不表现为阶级利益,人的存在形态也就主要地采取了“阶级存在形态”,这时,“政治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不能不使人注目于“阶级—国家政治”的精细研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伟大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因受时代的制约,人们的视界也往往被局限在“阶级政治”之中,日久便形成了一个传统的研究框架,那就是政治研究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政治的产生与发展与阶级共存亡,这个僵硬的框框严重地阻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劳动人本”理论,即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是在人的生存劳动过程中形成、发展和统一起来的原理,早已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政治同人类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劳动生存利益决定人的社会本质,等等。从这个理论中,人们应该很自然地得出政治起源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内在需要的结论;但把它明确地表述和论证,这不但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更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科学的政治思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概念的使用,是相当谨慎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曾使用了“一般政治”的提法,即“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一般政治”^[2](第57页)。联系当时学术界对史前史知之甚少情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用语可能是对阶级产生之前社会管理的一种说法。在国家出现以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实施以暴力为后盾的阶级统治,但也不可缺少对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的“一般政治”,应该是指阶级社会里与“阶级政治”对应的社会管理的“非阶级政治”。但是,到马克思晚年写作《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0-1881)年时,他却将其第二编的标题“政治观念的发展”改为“管理观念的发展”,即把“政治”改成了“管理”;而对该书“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等节标题则原文照录。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光辉著作中,也没有将原始的氏族制度冠之以始初“政治”或“政治权力”之类的名称,而是称做“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权力”或“自然形成的民主制”,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慎用“政治”概念于原始社会,是人之初就根本没有政治生活,还是另有原因呢?我们可否作这样的推测:马克思晚年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是:无产阶级早已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了,正直面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为夺取国家政权展开生死决战。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政治的阶级斗争特性,可能于教育、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无产阶级革命更为有利。刘德厚教授并不以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字面上

的有无为准,而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观出发,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创新思维方式“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关系中,分析政治生活是人实现社会生存的必然方式”,作出“阶级社会的政治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的统治力量,使政治异己化”的结论。由此,他把研究人类社会政治事实及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的政治理论以广义与狭义加以区别,即“研究人类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政治事实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被称为狭义性政治理论;而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包括史前社会)政治事实及其共同性特征和普遍性规律,则被称为广义性政治理论”^[3](第一章,第五章)。他开辟的“广义政治”研究的新境界及其“广义政治”学科概念的确立,不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和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就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原论的科学思维方法与敢于创新理论勇气,也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良好榜样,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二、劳动人本政治的价值取向与现实工具

千百年来,一切良善之士对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政治,无不充满了愤懑,可是谁也提不出一个人类解放的科学办法。人类究竟如何才能走出阶级政治的窘境呢?对此,惟有马克思的劳动人本理论即人的关系的本质性理论才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为社会主义政治的价值取向及发展战略的制订奠定了基础。人的劳动生存利益的内在需要,产生了最初的人类政治生活。当时人的生产能力极端低下,生产范围十分狭窄,群体的人数更是不多,主要的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也都直接取自于大自然。这种原始的自然劳动形式决定了人的自然生活形式,即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各种生活都是自然发生的,没有任何人造的痕迹。“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4](第 95 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财产私有观念日益发展起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了,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出现的商业和原始城市,进一步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阶级的分化与斗争,使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政治”变成了可憎恶的贵族政治,于是就发明了以暴力为后盾的实施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工具——国家(即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生产条件,把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压迫条件下。与此同时,劳动阶级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就在历史的进程中此起彼伏,各种幻想人类解放的“大同理想”、“世外桃源”以及“乌托邦”和“太阳城”之类的理论和故事,构成了劳动者的安魂曲。

作为政治工具的国家形态与特征是随着人的劳动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农业文明的自给性劳动造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它在政治上层建筑中需要的是绝对王权和独裁统治,所以支撑起以专制和等级制为特征的古代奴隶制国家政治和封建制国家政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农业文明向商品性劳动的工业文明过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要求建立以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政治。不论哪种国家政治形式,全都是实现剥削阶级价值理念的工具,它们并无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蕴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矛盾)深处的人的劳动生存利益关系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其劳动的异化性质及其后果。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为资本劳动,不过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他的苦难,他的个人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5](第 25 页)。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劳动不合人性、异化人的本质的国家政治,马克思、恩格斯严格地依据人类劳动形态的变化规律,特别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证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虽然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生产力,但现在已对准了资产阶级自己。它“不仅铸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6](第 257 页)。一旦生产力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资本主

义的国家政治被无产阶级革命摧毁,代替它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第29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劳动人本政治的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的真正本质还给人自己,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促使阶级政治走向社会政治。诚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摩尔根的话:“管理上的民主,社会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用什么样的政治工具来实现消灭阶级政治进而促使国家消亡呢?从马克思的劳动人本政治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来看,从无产阶级实现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终极目的来看,无产阶级用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工具似乎不应该是实施阶级压迫的国家;他们也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寻找到符合其价值理念的政治工具来创造自己的崭新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个既定的条件就是由农业文明开创的、工业文明发展的国家机器。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4](第438-439页)列宁依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际情况,对此进一步地补充道:“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7](第91-93页)在讲到剥削者阶级(地主和资本家)的“社会关系”时,列宁还特别强调了国内“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是跟他们走的,而且这些小私有者正是产生新一代资本主义的潜在土壤。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与无产阶级实施社会经济革命的艰巨任务,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但需要国家,而且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国家职能。

对胜利的无产阶级来说,国家工具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与实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弄得不好也会伤害自己。从劳动人本政治的本质要求上看,“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8](第646页),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使用的国家工具,最多也不过是“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9](第13页),其集中表现,就在于国家是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对经济基础既有依赖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及其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对社会经济发展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国家这种脱离社会、远离居民的特性,在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异化劳动并逐步将人的本质还给人自己之后,必然会同劳动人本政治的价值观,即政治的亲民性与社会性内在地产生复杂的矛盾。无产阶级的国家,总称无产阶级专政,其内容与活动方式,都不同于剥削阶级的国家,在性质上更具有质的差别。马克思称此“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第332页),列宁称此为“半国家”^[10](第124页)。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一切国家所具有的设施,但其本质是亲民爱民的,其发展方向是走向社会政治。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旧式国家官僚制的腐败性与害民性,马克思、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总结出三条重要措施:一是对官吏实行“民选民罢”制度,二是对官吏实行低薪制,三是立即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列宁在初期苏维埃的政治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了他们对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同时也从中看到了内伏的政治危机,即国家公权的难于监督与公职人员的官僚化与消极腐败问题。列宁认为,在政治实践中,如果对公职人员监督不力,新型民主的苏维埃就有可能或慢或快地演变成旧式官僚国家机器。1919年3月,列宁向全党发出警告说:“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10](第770页);翌年,他更是大声疾呼:“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11](第382页)。1921年3月,列宁痛斥“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12](第179页)。他晚年集中精力研究了苏维埃新型国家机关建设问题,其结论是“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7](第698页)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关官僚化问题,在“二战”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有发生。例如,196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题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篇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

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依据其表现，将其概括为 20 种形式之多^[13]（第 418-422 页）。可见，无产阶级凭借国家这个现实的政治工具去实现其价值理念，其道路是十分艰难的，甚至面临着旧国家政治复辟的巨大危险。当代发生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不就是鲜明的例证吗？

三、劳动人本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一个把合理的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其大大小小的艰辛与曲折，应视做趋势的常态。在历史上，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无不充满了曲折和反复；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更不会一帆风顺地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劳动人本政治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断、逆转，这虽然在历史的常理之中，并且还可以按照人民群众的历史逻辑，即“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而矫邪归正；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崭新制度竟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旧制度猝然复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巨大震惊和思考。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思考中更加理性、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政党政治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挫折乃至亡党亡国的社会大倒退，其根本原因就出在工人阶级执政党内，首先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混乱与错误。科学地总结这段历史教训，不但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人本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之艰辛，而且对当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极有裨益。

其一，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劳动人本政治建设的重要条件，不在于具有超强的暴力和铁的手腕，而在于工人阶级的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治党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去拓宽新的视野，开辟新的境界，总结新的经验，作出新的结论，解决新的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政治价值理念，既不要急功近利，采取许多违反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规律的办法“拔苗助长”；也不要国际关系中屈服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动摇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的信念与追求。进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新时期之后，国际政治力量的较量、多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均以前所未见的新形式、新特点显现于世。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民族立极，铸就国魂。

其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及时地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奠定劳动人本政治建设的物质基础。为了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但要坚决地对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行改革，而且还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努力地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造幸福。为了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还要敏锐地把握国内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尽快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创新竞争力走在世界的前列，以迎接后工业社会人类新型文明的到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势必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沦为世界发达国家的附庸，“会有贫穷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第 39 页）

其三，在取得了一定的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条件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性质上看，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从内容上看，这种改革必须是全面的，即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其他体制改革，尤其要把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证明：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按照中国的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首先是党政要分开,第二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14](第177页)。鉴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多从工业文明不发达和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产生,所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其主要弊端表现为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大力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加速国内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要力争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和尽可能深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广泛的对外经贸活动中,逐步习惯现代经济的国际环境,学习并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及其管理机制,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工具及其运行的各种规则,以便充分地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促进本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全方面发展;而且还要在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不断总结自身政治建设新鲜经验的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其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劳动人本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价值理念,其终极目的是争取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实现的艰巨任务。很明显,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初、中级阶段,即是说在阶级还没有消灭,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多种利益主体及利益矛盾(个别矛盾可能还带有某种对抗性和现实的冲突性)的情况下,国家政治是不可能完全人本化的,只能实行“民本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本政治”虽然在形式及其表述上,仍可遵循儒家的名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但包括一切劳动者,还应包括一切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一切爱国者,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坚持立党为公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列宁曾说,旧社会虽然死了,它的尸体却留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也埋下了国家变质的一条“祸根”。苏联和东欧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为了从行动上而不是从口头上落实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建设一支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就是刻不容缓的特大任务。只有这个任务一代又一代较好地解决了,“亲民政府”从形象到实质才能树立起来。当然,人也是会变的,少数腐败分子的出现也不奇怪(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但是党和政府必须旗帜鲜明:有腐必反,抓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用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更不允许社会上产生既得利益集团。

其五,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举宪政的旗帜,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和个人独裁,更不允许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的悲剧重演。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并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首先是要把党执政兴国和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宪法化。一切公民,都必须按照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发展人与人之间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执政党更应带头在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决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人物,更不允许有特权组织的存在。鉴于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出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母体,除了专制主义传统纠缠我们的新制度之外,公民基于文化水平低下而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都很薄弱。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十分必要的和紧迫的任务。对公民实施深切的人文关怀,努力培养他们的人权精神,充实他们的人格力量。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积以时日,就会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维护民主与法制的万里长城,从根本上保证劳动人本政治建设的顺利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M]. 杨东莼,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2]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3] 刘德厚. 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 [4]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6]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俄] 列宁. 列宁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8]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9]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俄] 列宁. 列宁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11] [俄]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4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2] [俄]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4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3]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叶娟丽)

New Search for Labour-humanist Politics: Theory & Practice

XIAO Bin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Wuhan City, Wuhan 430014,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O Bin (1939-), male, Researcher,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Wuhan City, majoring in political theory.

Abstract: Marx' labour-humanism theory opened out that political life came of human' s inherent demand of labour and survival interest and coexisted with human society. Politics is an activity of social public power dominated by the entire interest relations of political main bodies. Social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in general sense) and class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in narrow sense) are both different and relat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forms Marx' whole labour-humanist political theory, which is new achiev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 political research. Socialism is the transition from class politics to social politics and the process is filled with unparalleled hardships and zigzags. The labour-humanist political theory develop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temporary interrupts such as revuls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history direction that human will make for social politics cannot backspin at all.

Key words: the general politics; labour-humanist politics; social politics